



01

从城市治理角度看抗疫情 关键在提升社区应对能力

田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一个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应该包括常态化社会治理和非常态社会应急治理两大部分。其中，因细菌、病毒引发的各类瘟疫，是人类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典型应急治理案例。我们讲的城市空间治理，是对空间资源和要素的使用、收益、分配的系统协调过程，它通过很多渠道影响公共健康。一方面，空间治理会影响自然环境，包括大气、水和土壤环境品质，因而影响公共健康。比如有污染的工业会释放有毒气体、污染水源和土壤，因此必须远离生活区。另一方面，居民个体的生活环境如开放空间、道路交通环境、街道环境、当地饮食环境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健康。

严格来说，我国城市当前更多的是“空间管理”而非“空间治理”。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特点，借助政府、社会、市场、民众等多元力量，协同共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但是，在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管理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力量相对薄弱，社区和公众的参与有限，基本上依靠行政主导。如果行政管理层面出现问题，就会缺乏补救机制，造成严重后果。在这次疫情暴发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显得非常突出。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可以通过土地利用、公共设施和道路交通系统等环境要素的布局和优化，降低污染暴露程度，再从个体行为上引导居民进行体力活动，以及大众对健康食物的选择，从而来影响公共健康。日常生活中，对空间环境，尤其是公共空间的环境品质进行监控，对其健康影响进行评估，防患于未然，是事半功倍之策。而在传染病发生后，依据城市规划空间信息系统，科学划分防疫片区，配合“分级诊疗”，保障后勤供应，都是十分有益的。未来我国一定要强化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合作，发挥空间治理对公共健康的支持作用。提升社区在应对公共健康问题上的能力，主要还是及时控制传染源、加强信息共事与风险沟通、改善环境卫生控制传播媒介等。强化社区医院的能力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建设。由于长期以来对“分级诊疗”的忽视，我国社区医院的技术水平和硬件设备与大医院具有一定差距。对我国而言，历经此次公共卫生事件后，未来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来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提升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迫在眉睫又任重道远。

02

城市规划专家为何反对城市“摊大饼”式发展

李铁（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城市规划专家一直反对城市“摊大饼”的发展模式，主张发展卫星城或者新城、新区组团式发展，并设计了一个个“美好的蓝图”。因此，我国的一些城市管理者在制定规划和实施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也比较推崇卫星城和组团的模式，但在实践过程中大多并不成功。按照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城市沿着中心城区边缘向外扩张，是绝大多数大城市发展的规律。从世界上几乎所有超大城市的卫星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扩张的印记和路线图。可以说，向外“摊”的发展模式是城市自然扩张的结果，而不是规划师想象的模式。想象一个城市十分容易，拿一些理想的概念来强调城市的未来也很容易，但是建设和开发一个城市是要考虑经济和社会承受能力的。例如涉及的拆迁问题、与土地私有者的谈判、开发项目对社区的影响、政府财政能力和开发商财务能力等。因此在绝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的城市建设中，理想色彩可以让位于现实，让位于开发商和政府必须要面对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就导致了城市的规模越大，城市的“饼”状色彩越浓。特别要值得注意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城市“摊大饼”，是要在充分重视基础设施投入成本和服务业发展成本的前提下沿着城市边缘向外扩张的“厚摊”，而不是在各种政绩和视觉的主观意志下形成的城市四面扩张的“薄摊”。

近些年，我国的一些城市四面开花的粗放型城市发展的“摊大饼”模式，是一种严重浪费资源的“薄摊”模式，这也是在城市发展和规划中要吸取的严重教训之一。

03

公园城市代表城市发展更高级形态

林振聪（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市中心专家）：无论是打造花园城市还是公园城市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民参与，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城市与人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成都具备成为公园城市的良好生态基础与政策条件。公园城市具备更多公共空间功能，代表了城市发展更加高级的形态。公园城市的出发点应该是以人为本，公园城市理念是长期提炼出来的，所有开发理念和规划理念都是以人的需求推动的。在以人为本、以人的需求为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常常忽略了自然的“需求”，而大自然表达其诉求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进行城市规划与资源开发的时候不能只看眼前，应该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眼光。🏠